

## 层次分析视角下美以特殊关系的成因研究

李云鹏\*

**内容提要** 美以特殊关系举世闻名,其成因可以从体系结构、美以国内政治以及决策者三个层次进行解读。体系结构层次上,中东的地缘破碎和权力分布的两极拮抗特征,使美国的“中东共同安全”战略逐步丧失灵活性,促使美以特殊关系作为替代性方案出现。美以国内政治层次上,犹太社团对美国决策的强大影响是一个重要的非决定性辅助因素;而以色列国家安全严重依赖美援,束缚了其选择美以关系其他形态的余地。决策者层次上,工党总理秉持工具理性在以色列的长期执政,以及美国决策者亲以倾向的逐渐形成亦是推动美以特殊关系成型的重要因素。由于上述三个层面的因素对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具有正相关性,因此可以判断,美以特殊关系是双边战略选择的结果。最后,通过“求异比较”和“反事实推理”可以发现,“文化认同”和“战略利益”相互建构且缺一不可,是美以特殊关系构造的混合动因。同时,各类偶然因素的直接效用也不容忽视。

**关键词** 美国-以色列 特殊关系 历史成因 层次分析

中国崛起与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是近年来国际体系演化的一个重大趋势,它事关全球战略平衡和我国国家安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体系格局的宏大变化中,地区性小国发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关键作用,它们扮演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重要角色。因此,要理解美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意图和行事逻辑,就应当切实理解其外交布局中的小国要素。而美以特殊关系作为美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小国要素范本,则无疑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学界对此也多有认识。迄今为止,学界有关美以

---

\* 李云鹏,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特殊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在观察视野上，却存在一定局限，以往的大量研究成果基本上分别从纯历史学的角度和纯国际关系学两条路径展开论述。学科交叉、史论结合更为系统性的研究还比较少见。笔者抛砖引玉，尝试以交叉性的研究，即在坚持历史实证性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分析工具——层次分析法作为基本研究框架，辅之以变量控制、反事实推理等科学检验工具，以期重新梳理美以特殊关系的历史成因并总结其现实意义。

## 一 美以特殊关系成因的体系层次分析

体系层面因素是影响国家行为体行为选择最为直接和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结构现实主义<sup>①</sup>学派最为关注的研究分析对象。在这一分析层次上，体系的静态结构特征（包括战略和利益导向的硬结构以及认同导向的软结构）、体系结构中行为体互动的动态过程以及关键行为体的行为特性是最为重要的分析方向。

### 1. 体系层次的硬结构<sup>②</sup>分析

首先，从体系动态进程来看，影响战后美以特殊关系形成的第一个体系层面硬权力结构的原因是结构互动过程中美阿外交的失败与美以安全观的双向调整。

在美苏两极激烈碰撞的冷战格局下，作为地理上近接苏联，交通“两洋三陆”且具有丰富油气矿产资源的欧亚大陆腹地——中东地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布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在苏联成功爆炸核武器以及新中国建立之后，苏联一极及其外延力量的显著上升所造成的权力梯度，给美国带来了空前巨大的压力，为应对这种压力，美国政府遂将其对苏遏制政策的基本目标由追求相对安全遏止苏联“权力”调整为追求绝对

① 肯尼斯·华尔兹在1979年的奠基之作中称自己的理论为“结构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之结构是由国际政治上权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的结果而决定，结构制约并影响国家之长期战略与外交政策。国家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但在结构现实主义的概念框架下认为国家间并无功能上的分殊，国家在国际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是造成各国对外政策不同的主要因素。

② 以政治、经济、军事、战略、利益等硬指标为导向的国际体系结构，即客观物质的国际体系结构。

安全遏止苏联“全部的意识形态”。由此,美国外交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开始显著增加。在绝对安全原则的指导下,美国进一步加强了中东地区是美国对苏联围堵战略布局中重要一环的认识,其中东地区外交战略的具体目标也随之定位为构建地区整体性的共同安全和集体性的联合防御架构。而合理解决犹太裔新兴国家以色列与广大阿拉伯国家的冲突,推动中东地区两股互异力量的和解与合作则无疑成为美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前提和紧迫任务。这种认识充分地体现在1949年10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的名为《美国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政策》的NSC47/2号文件中,该决策性文件明确指出美国当局要“力促阿以争端和平解决”并且“应当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向阿以双方同时提供帮助和支持”。<sup>①</sup>1949年杜鲁门政府在其提出的第四点计划中更直接将以色列与包括埃及、伊拉克、沙特在内的广大阿拉伯国家共同列为受援对象。

然而,美国的这种做法显然是外交上的一厢情愿,因为其忽视了中东地区权力结构的具体特征,即犹太裔以色列国家与广大阿拉伯国家的互相对立与激烈对抗已经使该地区形成了一种拮抗性<sup>②</sup>的区域两极结构,在此僵硬结构下,美国共同安全战略构想的推进明显缺乏现实基础。而单就以色列来说,“共同安全”不仅意味着其必须与阿拉伯国家共享军事情报,还意味着以色列从美国获得安全报偿和偏向性支持难度的大幅增加。在美阿关系推进较为顺利的战后初期,这一情况长期横在美以两国之间,成为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

与美国的安全观完全不同,以色列认为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源于数量众多且立场强硬的广大阿拉伯国家而非苏联及其意识形态,而美国当局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援更被以色列视为对自身安全的直接威胁,况且以色列对东欧犹太裔移民的严重依赖<sup>③</sup>又决定其不可能与苏联彻底划清界限,因而以色列对美国中东地区共同安全的构想不感兴趣且冷淡应对。1949年初以色

①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ocument of NSC*, Vol. 2 (microfilm),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es, 1983.

② 生物学名词,指的是人体胰岛中胰岛细胞(降血糖)和胰高血糖细胞(升血糖)之间相互损益的共生关系,这里用来指代国家行为体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

③ Ronald W. Zweig, *David Ben - Gurion: Politics and leadership in Israel*, Frank Cass, 1991, pp. 222 - 223.

列驻美国大使就曾对苏联驻美大使表态称西方利益不决定以色列利益<sup>①</sup>，同年年中以色列则迅速出台了中立的不结盟外交方针。然而，以色列做出的相关敏感反应并未引起美国当局的重视，1950年5月为了贯彻落实 NSC47/2号文件所确立的共同安全精神，美国联合在中东地区具有影响力的英法两国，发表了反对阿以军备竞赛的共同宣言，宣言称“中东国家对军火物资的申请必须以整个地区的集体安全为重要前提”<sup>②</sup>，这实质上严重损害了处于战略相对弱势的以色列的根本安全利益。作为对美国类似行为的回应，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际以色列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美国当局关于以色列在朝鲜战争中支持美国的要求，以外交部甚至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称“美国把联合国变成了北约”<sup>③</sup>，以色列这一立场一直持续到杜鲁门政府部分冻结以色列治水贷款<sup>④</sup>之后才发生了较大转变。即使在1951年以苏关系开始遇冷，以色列计划争取大量美援之时，其仍不愿公开支持美国的地区安全努力，不愿公然地站在反苏立场上。

1951年，为了应对日趋紧张的东西方关系，美国出台了作为对 NSC47/2号文件重要补充的 NSC47/5号文件，这份文件仍然着重强调了美国当局化解中东地区阿以冲突进而争取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联合应对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必要性。<sup>⑤</sup> 美国中东地区共同安全的构想随之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种加强显然是以色列不愿看到的。因而在同年，当美英等国开始筹划组建中东地区共同防御组织“中东司令部”之时，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虽表态称支持这一组织运作的终极目标，但明确拒绝以色列参与任何具有约束力的西方多边协定，同时本-古里安希望与美国建立起直接的战略沟通渠道而不是受限于某种总体性协议。<sup>⑥</sup> 但美国对此并无明确回应，结果1951年10月中东司令部成立之时，受到邀请的埃及成为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

① Uri Blal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Israel'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1948 - 195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59.

② T. G. Fraser, *The U. 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World War II*,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 p. 63

③ Uri Blal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Israel'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1948 - 1956*, pp. 218 - 219.

④ Uri Blal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Israel'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1948 - 1956*, pp. 219 - 220.

⑤ 参见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The Near East and Africa*, Volume V,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 pp. 88 - 90.

⑥ 即以色列既希望获得美国的单独报偿，又不愿与潜在的安全威胁阿拉伯国家共享安全情报。

以色列则单独游离其外。1952年初,美国开始将中东司令部计划与有关军事援助挂钩,以色列方才认识到与西方协议保持某种联系的必要性,以内阁随即决定在说服美英并使其接受以色列战略协调方面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通过共同安全框架向美国提交军事援助申请。<sup>①</sup>结果到1952年底,美国最终默认了以色列对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援助协定即中东司令部的加入<sup>②</sup>,而以色列则勉强完成了对这一计划由游离抵制到逐步迎合的转变。

虽然在安全报偿的引诱下,以色列对美国中东地区共同安全计划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响应与配合,但其在共同安全问题上长期表现出一系列迟疑、暧昧与不合作的态度仍令美国当局感到不满,美国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作用的评价也随之出现持续性的下降,以色列是美国统合中东力量联阿遏苏战略布局中一大阻碍性因素及额外负担的认识越来越成为美国政府的共识。在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任期内,以色列的存在曾一度被描绘成地区安全威胁而被直接排除在美国中东地区北层防御结构《巴格达条约》之外。美国地区外交政策的天平开始显著倾向于阿拉伯国家。1953年6月自中东地区返回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演讲中甚至认为“阿拉伯国家与西方关系疏远的根源是以色列,阿拉伯国家需要获得报偿”。<sup>③</sup>在这一背景下,以色列多次向美国寻求的安全保障、售武要求以及构建美以双边安全框架的提议一直未得到美国方面的积极响应。艾森豪威尔曾对此直白地表示“只要阿以问题不妥善解决,他本人不会对构建美以双边安全联盟的提议予以认真考虑。”<sup>④</sup>1955年4月杜勒斯国务卿代表美国官方正式答复以色列夏洛特内阁有关构建美以双边防御协定的请愿时,也以同样思路回应以色列称“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安全保证的前提是阿以之间找到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案。”<sup>⑤</sup>

1956年4月,以色列向美国寻求安全保障的努力再度失败之后,转而

① Uri Blal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Israel'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1948 - 1956*, pp. 253 - 254.

② Uri Blal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Israel'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1948 - 1956*, pp. 253 - 254.

③ Abraham Ben-Zvi,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 Israel Alliance: The Jordanian Factor*, Routledge, 2007, pp. 13 - 14.

④ (美)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三联书店,1978,第526页。

⑤ Zach Levey, *Israel and the Western Powers, 1952 - 1960*,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p. 20.

向英法两国寻求相关安全许诺，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后者的积极响应。是年法国政府明确答应实现与以色列武器和战略上的合作<sup>①</sup>，同时英国当局也含糊地表达了支持以色列维护自身安全努力的基本态度。由此开始，英法以三国出现了短暂的战略联合。然而，英法向以色列提供和施加的安全承诺无疑是虚伪和脆弱的，这种虚伪性和脆弱性突出地体现在1956年爆发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中。1956年6月英法唆使以色列挑起西奈战争，进而发起了旨在重新夺取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对埃及联合武装干涉。之前毫不知情的美国当局对此感到大为恼火，并随即对英法以三国的战争行为频频施加外交压力。1956年11月8日美国罕见地向以色列发出包括停止美国官方及个人对以援助、将以色列逐出联合国等内容在内的严厉制裁威胁。<sup>②</sup>11月9日，迫于美国压力，以色列宣布停火，但其仍在撤军问题上保留立场。1957年2月20日，艾森豪威尔就进一步逼迫以色列撤军的问题与国务卿杜勒斯展开协商，在协商中，杜勒斯认为“只要美国向以色列传达坚决不妥协的信号，以色列就一定会立即撤军”。<sup>③</sup>基于这一认识，美国当局遂进一步加强了对以外交压力，同月21日艾森豪威尔旋即向以色列发出最后通牒，警告将取消以色列的军需品进出口特权<sup>④</sup>，同年3月1日，以色列最终被迫屈服，宣布撤军，美以关系随之降到了冰点。同时，英法两国倒行逆施的侵略行为遭到了世界范围的唾弃和谴责，在美苏两国的强大压力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直接冲击下，英法两国对埃及的军事干涉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其在中东的地区影响力也趋于瓦解。西奈战争中以色列的被动状态以及英法在中东地区力量根基的动摇，迫使以色列不得不重新反思其安全认知，即其不能在与阿拉伯国家严重对立的同时用损害美国地区安全利益的手段谋求自身安全。与之恰恰相反，以色列应当在尊重美国中东地区战略安排和安全利益的基础上，以务实的态度主动配合美国地区外交策略的推进以换得美国切实可行的安全保障，这才是以色列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

① (英)狄利普·希罗《中东内幕》，赵炳权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第357页。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Suez Crisis*, July 26 - December 31, 1956 Volume XV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1021 - 1022.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Suez Crisis*, July 26 - December 31, 1956 Volume XV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1028 - 1030.

④ 李伟建，《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第60页。

在这一认识指导下,以色列战略安全观出现了显著的转向,以色列与美国的地区外交战略由之前的相背而立,逐渐转化为相向而行。

总之,在1957年之前,由于文化制度上的渊源,美国与以色列外交关系较为特别,但就美国外交战略的实际布局来说,美以关系并无特殊之处,可以说美国对以色列的外交策略只是屈从于美阿关系的一个卫星策略,美以关系充其量只是美国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战略的一个次要组成部分,美以两国在安全认知上的分歧,严重制约了两国关系的发展,这也是导致以色列向美国寻求安全保障不断遭到失败的根源所在。然而在西奈战争失败这一巨大挫折的刺激下,以色列逐步放弃了其外交策略中与美国地区安全利益相悖的僵硬立场,从而完成了美以双边关系中一边外交策略的软化和转向。几乎与此同时,自1957年开始,美国地区共同安全战略的推行也逐渐陷入僵局。

1957年,中东地区局势出现剧烈变化,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英法两国蛮横的殖民主义作风激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集体公愤,本已初露端倪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随之如火山一般猛烈地喷发了出来,在这股民族主义旋风的冲击下,以英法两国为代表的整个西方世界在中东地区本就脆弱的公信力跌入谷底。与此同时,苏联借机通过政治、经济渗透快速挤进并逐步填补了英法势力受创后留下的地区权力真空,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开始与苏联走向联合。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构想遭到阿拉伯激进民族主义等地区极端势力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例如中东地区的民族主义强人埃及总统纳赛尔就不顾外交礼仪地公开向美国表态称,他“不准备为3000万、4000万或者5000万美元的贷款出卖埃及”。在纳赛尔激进情绪的催化下,1957年旨在反对西方(主要是美国)渗透的约旦危机和叙利亚危机先后爆发,整个中东地区阿拉伯各国的民族主义立场随之得到进一步强化,就连温和如科威特的阿拉伯国家也想做伊斯兰世界的良民。<sup>①</sup>美国对此深感忧虑,因而重新寻找可靠的盟友以约束被共产主义和极端主义控制的中东,这日益成为美国挽救中东地区外交战略危局的紧迫任务,这样一来,美国当局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存在的认知与评价逐渐出现改观,美以关系的转机也随之初现。

<sup>①</sup>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Arab - Israeli Dispute; *United Arab Republic; North Africa* Volume VIII,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p. 67.

1958年埃及、叙利亚以及也门组建联合阿拉伯共和国，高举泛阿拉伯主义的大旗，意在包围排挤亲美的约旦侯赛因政权；同年7月，伊拉克发生军事政变，新成立的卡西姆政府于次年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致力构建的中东地区北层防御体系因丧失中心国而遭到重创，阿美关系随之急转直下，美国中东地区外交政策面临着全面调整的巨大压力。美国政府意识到是苏联势力和阿拉伯激进民族主义而非以色列对美国中东共同安全战略构成了最为严重的威胁。

195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备忘录中明确指出“反对阿拉伯激进民族主义唯一合理的推论就是支持以色列这个中东地区典型的亲西方国家”<sup>①</sup>；一向对以色列态度冷淡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一反常态地认为“以色列可以牵制激进埃及的大批军队”。<sup>②</sup>类似论调表明，美国已不再固执坚持地区共同安全政策，其地区安全理念发生了初步的转型，在美国的外交估算中，以色列已经由之前难以确定的战略负担逐步转变为具有价值的战略资产。美国希望以色列这支近西方的中东异质力量能够扮演威慑者的角色，制约阿拉伯激进民族主义等极端势力的不断泛滥。察觉到这一情况的以色列迅速响应美国外交策略的调整，做出了主动配合美国中东外交策略的务实姿态。作为对以色列积极姿态的奖赏，1958到1960年艾森豪威尔政府破例给予以色列包括无后坐力枪以及S-58武装直升机等先进美制装备在内的大宗军售<sup>③</sup>，虽然在此期间，依旧留恋共同安全构想的美当局仍然拒绝向以色列提供鹰式导弹等重型武器，但这毕竟意味着美以关系的发展走出了迟滞期。

1960年，彻底放弃地区共同安全构想的肯尼迪总统一上台就破天荒的明确声明支持以色列<sup>④</sup>，1962年肯尼迪政府更是以应对苏联武装埃及为由，

①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Arab - Israeli Dispute; United Arab Republic; North Africa Volume VIII,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p. 727.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Arab - Israeli Dispute; United Arab Republic; North Africa Volume VIII,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p. 725.

③ Abraham Ben-Zvi, *The U. S. and Israel: The Limits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Harper Collins, 1994, p. 43.

④ Hebert M Druks, *John F. Kennedy and Israel*,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5, pp. 23-24.



史无前例地向以色列出售尖端的鹰式导弹系统,这一行为被很多人视为美以关系出现根本转折的标志。<sup>①</sup>为了回应美国方面的积极态度,以色列加紧了对美国中东外交政策的配合协调,1962年时任以色列外长的梅厄夫人公开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是西方世界的一员,应和美国共同履行对自由世界的责任。<sup>②</sup>这事实上肯定了美以战略关系的叠合。此后,在1963年爆发的约旦危机中,以色列主动配合肯尼迪政府所做的外交努力,为这一危机的合理解决贡献了巨大的能量。经此,以色列在美国外交资产的估算中已由抽象资产转变为实际资产。到约翰逊执政时期,美以关系的发展取得了进一步突破,以色列业已成为美国当局维系中东均势的重要环节。在此基础上,约翰逊政府加大了对以售武力度并表明了更多的安全许诺,以色列则以更为务实的姿态积极响应美国的具体外交需求。到1967年中东“六五战争”前夕,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甚至以让渡部分以色列安全利益为代价,进行了严格的自我约束,从而有力地配合了约翰逊政府的外交斡旋努力。由此,美以两国关系已呈现出一种不是联盟但胜似联盟的特殊性,美以特殊关系的雏形基本形成了。此后,美以两国关系的发展虽时有摇摆,但在总体上保持了高度的稳定与默契。

总而言之,战后初期,出于对绝对安全的盲目追求,美国出台了中东地区集体性的“共同安全战略”,希望同时争取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支持和配合。然而由于这一战略明显忽视了中东地区阿以之间业已形成的拮抗性两极结构,而在结构互动的过程中逐步丧失了灵活性。此后,美国当局逐渐放弃了陷入僵局的安全构想,转而扶持制度文化相近的以色列作为其地区代理人,以追求可能的美苏力量地区均势。在这一背景下,美国 and 以色列的战略安全观完成了由相背而立向相向而行的渐进转化,美以关系则在这种转化中最终形成了稳定的特殊性。对此,在1967年6月中东“六五战争”即将爆发之际,美国驻叙利亚大使奈特·瑞格维在一份评估以色列军事行动前景的电报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中东)地区政策20年来回环变化的结果就是把以色列变成了代表美国最高利益的重要支点……以此来平衡阿拉伯国家所代表的重要政治和战略意义。”<sup>③</sup>

① Hebert M Druks, *John F. Kennedy and Israel*, pp. 36 - 27.

② Hebert M Druks, *John F. Kennedy and Israel*, pp. 44 - 46.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 - 1968)*, *Arab - Israeli Crisis and War, 1967*, Volume XIX,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p. 717.

再者，就体系静态属性中关键行为体的行为特性而言，影响战后美以特殊关系形成的第二个体系层面硬权力结构的因素便是以色列强大和脆弱相结合的特殊行为体特征。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著名的战争机器，其国防军拥有杰出的组织调度能力和顽强的战斗意志。早在以色列建国之初的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新生的以色列军队就能够连连力挫在军队规模和武器装备方面占有明显优势的阿拉伯诸国联军，并使英国人有关以色列缺乏重武器，至多能抵抗两个星期的预言<sup>①</sup>成了笑柄。在1956年爆发的西奈战争中，以色列更以装备400辆坦克、155架军机，总规模只有10万人的军队击败了埃及在苏联大力援助下建立的装备有530辆坦克、255架军机，总规模达15万人的强大军队<sup>②</sup>，并仅以伤亡1096人的极小代价给予了埃及军队损伤11000人的重创<sup>③</sup>，从而有力配合了英法两国对埃及的联合武装干涉。虽然在埃及人民的英勇抵抗以及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英法以三国侵略埃及的行为以失败告终，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以色列国防军表现出的强大作战能力仍令世界印象深刻。自1957年开始，随着阿拉伯激进民族主义势力的迅猛抬头，美国的地区战略出现了显著调整，在美国逐步放弃共同安全计划转而寻找以色列作为地区代理人之后，以色列随即加紧了扩军备战，相关数据显示，从1957年到1966年中东“六五战争”前夕，以色列国防开支在GDP中所占比重由原先的8%攀升至14%。<sup>④</sup>凭借着自身雄厚且持续增长的军事实力，以色列不断在中东地区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1970年爆发的约旦危机中，正是由于以色列军队以炫耀式的姿态进驻戈兰高地，察觉到威胁的叙利亚当局不得不做出从约旦撤军的决定，中东地区的均势大局随之得以维持。对此，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表示“为在中东地区有以色列这样的盟友而感到由衷幸运”<sup>⑤</sup>。可以说，除1973年“十月战争”外，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武力压制都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地步。以色列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其捍卫自身及美国

① 季国兴、陈和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60页。

② 季国兴、陈和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战争史》，第149页。

③ 季国兴、陈和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战争史》，第160页。

④ 季国兴、陈和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战争史》，第231页。

⑤ Abraham Ben-Zvi,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 Israel Alliance: The Jordanian Factor*, Routledge, 2007, p. 77.

国家利益的出色能力,甚至有人认为美国拥有以色列就足以平抑苏联在整个中东地区占有优势的影响力。<sup>①</sup>以色列作为美国威慑苏联地区代理人、牵制阿拉伯极端势力的唯一王牌越来越得到美国政府的激赏。在此现实下,美以特殊关系形成的基础越发牢固了。

然而,不得不说的是,以色列虽然具备令人钦羡的强健实力,但就数值来说仍然只是一个战略纵深狭小并为外敌所包围的蕞尔小国,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它可以在战场上取得无数次胜利,但它绝对经受不起任何一次失败,任何一次失败对以色列来说都可能是灭顶之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色列维系自身安全的能力又是极度脆弱的。1964年6月出访美国的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在会见美国总统约翰逊时就公开提醒后者“安全问题是事关犹太民族存亡的首要问题,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就一直为外敌所包围,并长期处于埃及200枚导弹的威胁之下。”<sup>②</sup>对于美国而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以色列的稳定与否直接关乎着美国地区战略和安全的兴衰成败。一旦以色列有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势必遭到沉重打击。因此,为了保证以色列的持续生存和安全,美国便需要在外交政策上给予以色列特殊的偏袒、照顾甚至迁就。这就造成了在中东问题上,以色列时而“以弱凌强”牵着美国外交鼻子走等奇异现象的存在,而这种“以弱凌强”则无疑进一步促成并加深了美以安全关系的特殊性。

总的来讲,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的重要行为实体,既具有捍卫域外大国地区利益的强大行为能力,又面临着生存环境极度脆弱的先天性安全缺陷。这种强大和脆弱紧密结合的两面特性造就了以色列罕见且特殊的行为体特征,也使得域外大国的对以外交需要一种特别思维。而对于美国的地缘外交策略而言,以色列能够捍卫美国利益,意味着美国应当给予扶持;以色列需要生存安全保障,又意味着美国必须给予迁就。美以行为体在长期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种“能够”——“扶持”以及“需要”——“迁就”——对应关系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就体系结构的地缘属性来说,影响战后美以特殊关系形成的第三个体系层面硬权力结构的诱因是中东地区地缘构造的深度破碎性。虽然地理环

① 参见〔日〕田上四郎《中东战争全史》,军事科学院译,解放军出版社,1985,第101页。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 - 1968)*, Arab - Israeli Dispute, 1964 - 1967, Volume XVIII,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 65.

境决定论早已为学术界所摒弃，但不可忽视的是，地理环境特性确实能够严重影响具体事物的演化发展轨迹。因而，作为一种具有最高解释力的研究视角，地理环境层面的分析仍然不可或缺。

具体来看，在宏观地缘构造层面上，中东地区是由北部高地、中部区以及南部沙漠区三大地理构造系统拼合而成，三大构造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自然环境差异，这种差异性甚至超过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文化近似性而将中东阿拉伯世界直接切割为三个相互显著区别的权力复合体系。其中，北部高地和中部地带在近代以来曾长期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支配，而南部沙漠区的大片土地尤其是其亚洲一侧则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及独特的社会组织形态而成功拒阻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权力的渗透和介入<sup>①</sup>，进而长时间保有稳定的独立。这种统一性霸权和地区排他性权力的持续分立又将原先中东地区的三大地理构造系统斜割为西北面的帝国准定居文化体系和东南面的贝都因游牧文化体系。这样，从宏观层面上看，中东地区的权力分布经受了时间和空间层面的两重切割，已成碎裂状态。

然而，如果留意观察，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中东地区每个独立组成单元内部并不都是完整统一的，例如作为中东地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部地带，即黎凡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次级碎裂带（或者说是嵌入在中东地区破碎带中的破碎带）。中东地区经历过复杂的权力演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宰性力量宣告土崩瓦解，西方列强随即以委任统治的名义直接介入并重新分割了这一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短暂的地区支配权又告终结，原来被各类外来强权压制着的民族主义势力随之迅速崛起，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然而由于地区权力走马灯式的持续更替以及历史纷争和殖民遗留问题的普遍存在，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之间矛盾分歧重重、权力冲突持续不断，战乱和纷争逐渐成为该地区的常态。因而，在类似复杂情况的作用下，中部地带的权力构造呈现出明显的细碎化特征，而这种次生地区权力分布的细碎化则又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整个中东地区地缘结构的深度破碎性。再者，中东地区虽然共享着

<sup>①</sup> 详见“瓦哈比运动”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阿拉伯半岛权力存在的数度冲击及深刻影响。

极其相似的文化话语,但却缺乏一个唯一且稳定的区域历史文化核心,这一现实严重削弱了中东地区结束碎裂状态走向统一联合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历史上曾经支配中东世界的各文明帝国的中心从德黑兰、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到伊斯坦布尔、麦加和尼尼微,它们之间不仅差异巨大、相距甚远,而且其中任何一个中心都不具备推动中东地区走向整合统一的足够号召力,相反,这种多历史文化核心的状态还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加深了中东地区权力结构的多元分散特性。

综上所述,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的多样性和多节点特征阻碍了它形成一个稳定的地区性或亚地区性地缘实体的潜在可能<sup>①</sup>,并且使得任何一种来自地区内部或外部促统整合方案实施的前景都显得极为暗淡,这便是战后初期美国在中东地区致力推行的区域共同安全计划屡遭挫折并最终流产,美以特殊关系作为替代方案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深层原因所在。

## 2. 体系层次的软结构<sup>②</sup>分析

除了基于权力、利益等硬实力因素的结构现实主义分析模式外,我们还应切实理解和重视建构主义<sup>③</sup>学派所强调的人的能动作用,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权力、利益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观念使然,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认同是决定国家关系亲疏冷暖的深层次原因。<sup>④</sup>而笔者进一步认为,以上述软性主观因素为基础,还存在着另一种权力分布状态,这种权力分布状态实际上又构筑出可称之为软格局的新型国际体系结构。在这一结构下,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和行为选择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就美以关系本身而言,两国之间相近的宗教文化传统和相似的政治制度理念不仅夯实了两国关系特殊化发展的根基,还在软格局层面上为这一关系赋予了长远而深刻的特殊战略意义。

首先,从宗教文化层面讲,在西方基督教文明内部,犹太希伯来文化

① (美) 索尔·伯纳德·科恩 《地缘政治学: 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第407页。

② 以文化、认同、话语权等软实力指标为导向的国际体系结构,即主观意识的国际体系结构。

③ 国际关系建构主义之父亚历山大·温特提出了建构主义的两个核心概念:一是人类的社会结构是由人类社会的主流观点塑造成的,而不是由物质力量驱使成的;二是社会舞台上出现的角色受到的影响来自他们的身份和兴趣而不是本性。

④ 俞新天 《掌握国际关系的密钥——文化、软实力与中国对外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6、7页。

与美国新教文化的相似性和同源性为美以关系的良性互动打下认同基础的同时,更赋予这一双边关系极富浪漫色彩的“神圣同盟特征”。具体来说,作为现代以色列国家开创者的犹太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以古希伯来经典《旧约圣经》为正统,并以犹太先祖是义人后代,受神垂爱赐福和立约拣选,肩负传播神恩泽和戒律之使命的具体记载为神性依据,形成了以“天选子民观”为核心并包括救赎观、救主观、圣史观在内的犹太民族意识形态。这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意识形态作为犹太民族的世界观,直到今天还深刻影响着现代以色列犹太国家的行为选择,其基本内涵可以简单概括为刻苦奋斗的顽强精神以及我行即神意的选民意识。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美国由于长期受新教文化熏陶,逐步形成了被称为“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独特宗教观,这一宗教观区别于欧洲天主教和部分古典基督教派,其更崇尚希伯来文化和《旧约》经典,较为倾向早期基督教继承自犹太教的传统教义(即倾向于承认犹太民族的选民身份)。因而与欧洲诸国不同,美国几乎不存在反犹主义。同时,这种亲希伯来文化的独特宗教观还极为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美国的政治及社会形态。

从历史来看,现代美国人的原祖便是带有浓厚新教主义色彩的英国清教徒,作为最早定居北美大陆的西方先民,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们将其宗教浪漫主义情怀与现实政治的极度失意结合起来,他们引用《旧约》出埃及记的相关记述,把自己比作犹太选民,把英国天主教国王比作邪恶的埃及法老,把北美大陆比作迦南赐福之地,并将其受英王迫害逃往北美大陆的整个流亡过程类喻为犹太选民在上帝指引下脱离法老暴政重返迦南建立古以色列国的神圣史诗。至此,一种作为上帝选民注定要完成伟大使命的“昭昭天命观”,烙印在历代北美定居者的血液之中。而到18世纪后半叶新生的美利坚国家初创之时,这种根植于古典希伯来文化的北美地区性宗教观念甚至被美国国父作为美利坚建国的重要理想,而隐晦的写进了以《独立宣言》为代表的美国国家纲领性文件之中。因此可以说,宗教理念尤其是“犹太—基督教”式的宗教理念自美国建国之日起就已经作为美国政治的基本依托,深刻影响着其具体的行为选择和国家思维。

到了19世纪中旬,在美国西进运动如火如荼之际,美国外交理论家欧利沙文首次放弃了以往的隐晦说辞而直接用“昭昭天命”一词形容和鼓励

美国人的开拓精神,至此源于“犹太—基督教传统”名为“神治国家、昭昭天命”的强烈宗教概念便从美国历史的幕后走向了台前,并进一步为美利坚民族塑造了相通于犹太民族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傲慢的救世主意识。对此,美国著名作家麦尔维尔曾直截了当地点明道“我们美国人是特选的民族——犹如当代的以色列人。”<sup>①</sup>

总而言之,在宗教思维和认知上,犹太民族的选民观与美利坚民族的天命观因其高度的同源性和相似性成功突破二者的时空隔阂进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相互认同,而由这种共鸣与认同带来的美以两国间的高度互信使两国历史上的关系始终稳如磐石。即便在1948~1957年美以关系尤其是安全关系最为冷淡的时期,以色列仍然享有美国在安全领域之外给予的种种特殊照顾,而美国做出的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选择则无疑带有浓厚的宗教文化感性色彩,例如坚决支持以色列复国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克利福德口中“虔诚的《圣经》学徒”<sup>②</sup>——在听到以色列驻美大使引用《旧约》中犹太人复国的预言向美国表达感谢之情时,竟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在应许之地上重建以色列就意味着基督的二次复临。<sup>③</sup>1966年约翰逊总统在接待来访的以色列总统时曾深情地总结道“我们两国都是在希伯来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希伯来文化带给人类道德、公正以及和平的准则,这是我们的共同遗产,也是两国关系的牢固基础。”<sup>④</sup>

其次,从政治制度层面来讲,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重要的民主示范效应与美国制度普世主义情怀的良好对接,在软格局层面上为美以关系的发展赋予了极具特殊性的战略意义。受历史传统惯性、宗教理念以及复杂现实条件的深刻影响,战后中东地区的新兴诸国中,除完全奉行议会民主制的以色列以及世俗化的“半民主制国家”土耳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处于集权色彩浓厚的君主制甚至是绝对君主制以及总统或领袖共和式的专制政体之下,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不仅极为缓慢而且普遍存在着凌驾于国家权威之上的顶层力量。中东地区诸国这样的政治制度现状显

① Peter Gross, *Israel in the Mind of America*, Alfrid A. Knopf, Inc., 1984, p. 5.

② Michael, T., *Tureman and the Founding of Israel*, Praeger, 1997, p. 55.

③ Edward Tivnan, *The Lobby: Jewish Political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p. 181.

④ Lorenza Rossi, *Who Shall Guard the Guardian Themselves?*, Peter Lang Press, 1996, p. 81.

然同美国标榜和认同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之间相距甚远，由此产生的心理隔阂严重影响着美国中东外交政策的决断。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比如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才是决定一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性因素。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所谓的国家利益并非是一个单维度概念，它具有多维性和多元内涵。除现实的物质利益外，包括政治制度、文化认同以及意识形态在内的软性因素。这实际上深刻影响着一国决策者对本国国家利益具体构成和内在属性的基本判断。西方学术界在谈及国家合作问题时就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民主国家互无战事”，他们普遍认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民主制是调和一切冲突纷争最有效的方法。

从实证的角度来看，近代以来，对立甚至仅是不同的政治体制都往往会引发国家之间的激烈对抗，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美苏冷战诱因中的政治制度分歧要素。而从战后初期美阿外交关系的互动中，我们更可以清楚看到，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基于现实利益的合作往往是十分脆弱的，在1958年，仅一场军事政变就粉碎了美国与伊拉克亲密的合作关系。与之相反，以色列作为一个不受中东专制主义传统影响的典型民主制国家，与美国之间拥有着深厚的互信基础，这种互信基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战略和利益层面的离合变幻，维持了美以两国之间分而不裂、和而致密的外交联系。比如美国舆论界就有一种普遍的认识即“美国可以与许多阿拉伯国家发展朋友关系，但只能与以色列一个国家发展盟友关系”<sup>①</sup>，因为“以色列作为一个民主制和西方化的国家可以在军事紧张时期作为美国的可靠盟国，而阿拉伯国家由于其非民主制和非西方性在军事紧张时期不能获得信任”<sup>②</sup>。同时，对于具有浓厚普世主义情怀的美国而言，稳定支持以色列这个嵌入在中东地区专制主义丛林的民主前哨，更可为美国的普世理想的实践提供某种潜在可能。

总而言之，一系列事实证明，包括文化、制度因素在内的软性概念具备着一种潜在且深刻的战略属性，而这种战略属性与国家行为体的绝对安全息息相关。在文化因素起重要作用的古代东亚朝贡体系中，接受中华文明和儒教思想的国家往往对中国抱有极大的信任和忠诚，反对中华文明和

① 高祖贵 《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第30页。

② Mohammed, E., *Ethnic Group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Greenwood Press, 1987, p. 13.



儒家思想的国家和地区则往往会成为中国的威胁和死敌。与此高度类似,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和宗教价值观的国家行为体都会对西方秩序抱有高度的认同,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和宗教价值观的国家行为体则会对西方秩序怀有种种质疑。而在西方国家看来,前一种国家无疑是进步和无威胁的,后一种国家则肯定是邪恶和有威胁的,文化和制度的同化则是西方国家应对和消除类似威胁的有效途径。以色列作为专制主义中东的唯一民主国家,异质伊斯兰世界唯一的基督应许之地,对美国而言有着突出的重要性,因为它可以发挥无与伦比的文化和制度同化效用。而对于以色列而言,与制度文化近亲美国的合作则是昭示以色列存在合理性的方式。1974年6月美国总统福特在款待来访的以色列总理拉宾时认为“美国与以色列拥有共同的志向和目标,如果将这种志向和目标扩展到世界范围的话,那无疑将会惠及全人类。”<sup>①</sup>因此可以说,体系软结构层面上的文化和制度认同因素是美以特殊关系形成的一个深层原因,并为这一特殊关系赋予了极为深远的战略意义。

## 二 美以特殊关系成因的国内层次分析

外交是内政的自然延伸,一国国内政治的具体情况实际上深刻影响着其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美以特殊关系的最终成型也离不开两国国内政治要素的深刻作用。

### 1. 美国内政中的犹太因素

从国内层次的美以一侧来看,美国犹太政治势力频繁的亲以活动是美以特殊关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一因素即是美以特殊关系最终形成的根源。

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99%以上的美国人都是移民和移民后裔。<sup>②</sup>先天性的多元移民体系为美国社会赋予了平等、包容和开放的特质,因而饱受欧陆排犹主义之困且居无定所的犹太裔族群普遍将美国视为精神

<sup>①</sup> Bernard Re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nfluence in the Special Relation*, Praeger, 1984, p. 185.

<sup>②</sup> (美)戴维·莱文森《世界各国的族群》,葛公尚、于红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第665页。

上的理想乡阿瓦隆<sup>①</sup>并对此趋之若鹜。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初，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德国和俄国的犹太先民先后掀起过五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定居美国的犹太族裔人群的数量也随之持续上升并最终达到了 600 万左右的规模。同时，由于旅美犹太人及其后裔具备良好的教育素养、天才般的商业头脑以及敏锐的政治知性，犹太族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实现了节节攀升，其中的精英群体更后来居上，逐渐大量占据了美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的重要席位。据统计，仅 1841 到 1926 年就有 41 名犹太人和 5 名犹太后裔当选美国国会议员。<sup>②</sup>借此，总规模不到美国人口 2% 的犹太族群逐步成长为能够左右美国内外政策的强大话语力量。

1948 年，随着新生以色列犹太国家在中东地区的成功建立，全力支持以色列这个全世界犹太人的应许之地成为美国犹太势力投放话语、发挥政治影响力的焦点所在。民调显示，自以色列诞生以来，有超过 90% 的美国犹太人都把支持以色列作为自己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sup>③</sup>，并且他们普遍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不是外交而是内政，无条件支援以色列就是在维护美国的根本利益。<sup>④</sup>在这一认识指导下，美国犹太势力在多个层面上相继发起了声援以色列、力促美以关系特殊化等一系列声势浩大的运动。

首先，在政治层面上。美国犹太人就通过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国会院外集团对美国国会和政府的中东问题决策进行反复游说，甚至还有犹太政治势力以操纵国会选举和发言的极端方式直接影响并参与了美国当局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例如在 1957 年西奈战争停火之后，为了反制艾森豪威尔政府要求以色列无条件撤军所施加的外交压力，以色列当局就曾一度频繁联系美国国内的主要犹太势力，催促犹太政治力量发挥切实的影响力以改变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基本立场，结果在犹太社团的推动下，

① 即凯尔特神话中的“理想乡”。传说中，阿瓦隆 (Avalon) 四周为沼泽、树林和迷雾所笼罩，只有乘坐小船才能抵达。在亚瑟王的传说中，阿瓦隆象征着来世与身后之地，是彼世中神秘的极乐仙境。

② A. F. K Organski, *The 36 Billion Bargain: U. S. Aid to Israel 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0.

③ A. F. K Organski, *The 36 Billion Bargain: U. S. Aid to Israel 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1990, p. 16.

④ Kennan Lee Teslik, *Congress, the Executive Branch and Special Interests: the American Response to the Arab Boycott of Israel*, Greenwood Press, 1982, p. 32.

美国国会中以林登·约翰逊为代表的一大批议员纷纷表态指责艾森豪威尔对以色列采取“双重标准”。虽然艾森豪威尔顶住了这股来自美国内部的舆论压力,但其最终也不得不向以色列做出缓和的姿态,1957年2月,美国当局在一份交给以色列政府的秘密文件中额外强调“(以色列撤军后)美国将设法保证加沙地带的中立以及亚喀巴湾国际水域自由通行的权利”<sup>①</sup>。可以说,美国这份保证的提出就是犹太政治势力活动的直接结果。如果进一步从有关研究的宏观统计数据来看,1945到1984年间,在美国当局做出的782个关于中东问题的决策中,就有多达297个决策是当局最初不愿做出的,最终犹太社团的多方游说力量说服了当局。<sup>②</sup>这足见犹太政治游说力量的威力之大。而就犹太势力对美国选举风向的影响力而言,对美以关系转型影响深远的肯尼迪之所以顺利当选美国总统,犹太选票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因为超过八成犹太人的鼎力支持是其取得纽约与伊利诺伊两州大选胜利的关键所在,而这两州的角逐更直接决定着白宫候选者的最终命运。对此,肯尼迪后来会见本-古里安时表示“我的当选受益于犹太人,我必须也肯定要为他们做些事情。”<sup>③</sup>

其次,在安全情报层面上。犹太政治社团及其情报系统对美国要害部门的控制和渗透已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以色列当局凭借犹太情报网的巨大作用甚至间接地掌握了美国中枢系统的神经运作。例如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初期,以色列在军事上遭遇了巨大挫折而损失惨重,为了挽救危局,以色列当局迫不及待地向美国当局提出了需要大量90毫米坦克炮弹的军援要求。五角大楼闻讯立即展开了相关军备的搜寻,但无果而终,一位五角大楼官员回忆说“当时确实无法找到炮弹,我们找遍了全国各地和三军武库,却没有找到一发90毫米炮弹。”结果以色列当局立刻来函告知五角大楼称“夏威夷海军陆战队军需库中就有15000发炮弹”<sup>④</sup>,五角大楼按以色列当局提供的情报果然在夏威夷找到足量的军备,这一事实震惊了许多美国高官,因为

① 参见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第362页。

② Camille Mansour, *Beyond Alliance: Israel and U. S. Foreign Poli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56 - 257.

③ Steve L. Spiegel, *The Other Arab - Israeli Conflict*, Chicago: Chicago Press, 1986, p. 96.

④ 见1980年11月7日对美国国防部官员托马斯·皮安卡的采访,转引自保罗·芬德利《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第168页。

以色列在美国找到了美国人找不到的美国军备!

再次，在经济层面上。实力雄厚的美国犹太财阀屡次不惜工本地从多种渠道给予以色列政府以巨大的物质援助，这些物质援助不仅极大程度上夯实了以色列国家的生存基础，而且也切实地增强了其与美国当局讨价还价的政治底气。

最后，在舆论层面上。美国犹太势力通过 NBC、ABC、《纽约时报》等犹太社团直接控制的大型媒体喉舌，多次向美国公众发起美化以色列、强调美以关系重要性的强大舆论攻势。这些舆论攻势在极大程度上塑造了普通美国公众对中东争端的一般看法，并在事实上促成了美国民意的强烈亲以倾向，使得以色列利益与美国利益直接挂钩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总之，有感于美国犹太人在支援以色列问题上坚决而又强大的影响力，时任约翰逊政府高级顾问的罗奇曾惊叹地总结道：“这个国家从华盛顿到加利福尼亚，所有的犹太社团都完全站在一个政治立场上说话。”<sup>①</sup>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犹太人社团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对美以关系的发展确实起到过极大的助推作用，这是不能忽视的。但若静下心来，从这一关系发展的全局图景来看，美国犹太政治力量的多方活动与美以关系的发展之间实际上并未呈现出完全正相关关系。不要忘记，在美国犹太社团强烈支持以色列的战后初期，美以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且挫折不断，在 1957 年有关以军从西奈半岛撤军的问题中，艾森豪威尔就曾在对以色列劝说无果的情况下命令美国财政部长乔治调整美国税率，以削减犹太社团所获政治捐献。<sup>②</sup> 这一强硬姿态顶住了美国犹太政治力量的巨大压力，从而向以色列发出了空前严厉的制裁威胁。反倒是在美国犹太势力对以色列支持力度出现显著下降的 20 世纪 80 年代，美以关系却得到了彻底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了稳定的关系。因此可以说，美国犹太裔社团声援以色列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只是美以特殊关系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辅助性条件（黏性条件）而非决定性因素，更莫说是美以特殊关系形成的根源所在。

<sup>①</sup> Edward Tivnan, *The Lobby: Jewish Political Pow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mon & Schuster, 1987, p. 63.

<sup>②</sup>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Suez Crisis*, July 26 - December 31, 1956, Volume XVI,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1325 - 1327.

## 2. 以色列内政中的美国因素

国内层次从以色列一侧来看,其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对美国援助的全方位依赖限制了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回旋余地并最终勾勒和坐实了美以双边关系特殊化发展的愿景。建国之初的以色列面对中东地区极度恶劣的生存环境,迫切需要某种程度的外部支持。就当时国际环境而言,有三股力量可供以色列选择,即中东地区的广大阿拉伯国家以及美苏两个域外超级大国。具体来讲,中东地区的广大阿拉伯国家虽然有毗邻以色列的地缘优势,但其不仅对以色列的存在普遍抱有严重敌意,而且也并不具备对外支援的潜在余力。而域外超级大国中,由于在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与以色列没有交集,苏联对支援和拉拢以色列也同样不感兴趣,并且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作为还长期被苏联视为历史逆流而遭其警惕,这就迫使以色列不得不寻求文化和制度与其相近的美国予以支援与安全保证,而美国也积极地响应了以色列的类似诉求,不仅在以色列宣布建国之后的短短16分钟内就迅速予以承认,而且还在以色列建国后最初的一年内就给予其总额高达2亿美元的贷款<sup>①</sup>,这笔超过英国全年全球援助支出总和的巨额贷款对于初生的以色列起到了不容低估的巨大作用。自此,美国对以色列的各项援助累年攀升,即使在美以关系由于两国战略定位冲突而发展困难的1948到1955年,以色列仍从美国获得了超过阿拉伯国家所获美援总和2.25倍总计高达3.75亿美元的大规模物质援助<sup>②</sup>,甚至就连以色列争取东欧犹太移民所需经费,也有2/3来源于美国<sup>③</sup>,虽然此时美国对以援助只限于经济民生范畴并不涉及军事安全领域,但这种持续性的物质支援仍有力带动了以色列实力的迅速提升和安全环境的不断改善。

1957年之后,随着中东局势的剧变,美国逐步开启了对以色列的军事安全支援且其力度呈逐年增加的态势。自肯尼迪政府打破惯例向以色列出售鹰式导弹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对以军售便一发不可收拾,包括鬼怪式和天鹰式战斗机在内,同时代最先进的美制装备开始持续不断地流向以色列,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以色列军队在中东地区的作战实力与威慑力,同时也使以色列在安全问题上越来越依赖于美国。因此可以说,以色列安

① (英)狄利普·希罗《中东内幕》,赵炳权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第312~313页。

② 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43页。

③ Uri Blal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Israel'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1948-1956*, pp. 222-224.

全保障的直接来源就是美国方面持续不断的售武。除大规模军事援助外，美国还经常性的动用直属武力协助配合以色列所谓“谋求安全”的军事行动。例如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隶属美国第六舰队的航空部队就执行了保护以色列领空、掩护以色列地面部队攻势的作战任务。而第四次中东战争早期，也正是由于美国的直接介入，以色列才获得了逐步扭转劣势并转危为安的契机。从1957年开始，在经济民生领域内，美国对以援助力度也出现了持续性的加强。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年均给予以色列的贷款甚至赠款的数额就达到了30亿美元。据统计，自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总计为以色列提供了超过967亿美元的大宗经济援助。<sup>①</sup>对此，连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艾班都不得不感慨地称“纵观整个近代，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以色列一样从美国获得过如此多的生存权利。”<sup>②</sup>因此可以说，以色列的生存安全和经济基础是在美国的援助下建立起来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作为二战后中东地区新兴的国家，以色列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强大外部力量的有力支持，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历史文化现实成因，美国担纲了以色列核心外部支援者的角色，而美国对以色列不可或缺的持久支持又实际上大大加深了以色列对美国的依附性和黏合性。认识并利用到这点的以色列政府，逐步将其生存与安全问题的直接与美以关系的发展互动挂钩。应美国要求在中东“六五战争”中保持惊人克制的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就曾明确地表示“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根本无法生存”。如其所言，在安全与发展问题上严重依赖美国的以色列不可能拥有足够外交选择空间回避或拒绝美以关系超限度或者说特殊化的演进。因而，作为美国中东地区利益代理人，经常性的配合美国地区外交战略，推进美以两国间无约而盟的亲密关系以换取美国的安全许诺和利益报偿便逐渐成为以色列政府推行外交政策的一个长期方向，而且这一长期外交方向天然地拥有着并不亚于以色列国内政治意义的特殊重要性。这便是影响美以特殊关系的另一个国内方面的原因。

### 三 美以特殊关系成因的个人层次分析

个人层次的分析中包含关键个人与决策角色两种分析取向，而就美以

<sup>①</sup> *Total U. S. Aid to Israel and Palestinians*, <http://www.cnionline.org/learn/aid/aid-total.html>.

<sup>②</sup> 徐向群、余崇健主编《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第434页。

特殊关系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而言,并不存在一个极为突出的关键个人,所以以整个决策层为考察对象的决策角色分析是较为合适的方式。同时,由于美以特殊关系又是一种不对称的特殊关系,对于具有主导权的美国决策层而言,相对弱勢的以色列决策层的作用效率实际上更为重要。因此,对以色列决策层详细深入的探讨就很有必要。因而,从个人层面讲,以国父本-古里安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者工党派系总理在以色列的长期接力执政显然是分析美以特殊关系成因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在世界锡安主义运动<sup>①</sup>中贡献卓著的工党元老们理所应当地占据了以色列政坛的核心位置,并有效把持以色列议会民主制国家总理席位长达数十年之久。此间,无论是本-古里安、夏洛特、艾希科尔抑或梅厄夫人担任总理一职,都在极大程度上秉承了一种以实际利益为中心导向的现实主义作风。而这种极富工具理性<sup>②</sup>色彩的现实主义作风在极大程度上为美以关系的发展保留着充足的灵活性和潜在的可能性。如果留意观察以色列政治史,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一种有关美以外交关系变化的规律性现象,即但凡工党总理执政,美以两国关系的互动过程就会相对圆滑,两国关系的推进就有可能取得一定进展,即使不济也会维持总体稳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要后来崛起的年青政治势力利库德集团领导人上台(贝京或是一个例外),以色列外交政策就会明显的意识形态化,美以两国外交关系的互动也就经常会受到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固执坚持的“大以色列主义”价值取向的冲击而遭遇波折。因此可以说,美以两国关系在形成特殊性之前,务实稳重的工党派系总理的长期不间断执政对于美以关系的特殊化走向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辅助性意义。而这里就有两个疑问,一是为何个性不尽相同的以色列先驱工党总理会持续秉承务实灵活的现实主义外交方针;二是工党派系总理的这种现实主义实用外交又是如何影响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的。这些都是需要从层次分析法的第三个人层次入手展开讨论。

---

① 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② 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而服务。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说“效率理性”。

### 1. 以色列决策层外交禀赋的成因简析

首先,就第一个疑问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色列国家先驱工党最初的几任总理之所以能持续传承现实主义工具理性禀赋,其根源在于早年犹太复国运动在实践中长期面临并经历的复杂现实国际政治环境。作为以色列建国元勋,工党元老们出生并成长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一个铁血交织、烽烟四起、尔虞我诈且极端现实的时代,他们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残酷严苛、互不信任的时代,同时也是近代以来国际体系充满无政府色彩和丛林法则的时代。零和博弈性的实力游戏与生存法则在他们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使得以实力、利益、等价交换以及报偿为核心概念的工具理性成为他们实现政治抱负的基本行为准则。本-古里安就曾明确声称“决定以色列命运的只有两件事,即它的实力与正义”,而“以色列的存在则只能归因于以色列人民,而且应主要归因于以色列人民的军队”<sup>①</sup>,这一论断已经为以色列对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整个历史过程所充分检验。

另外从具体实践的角度说,早年犹太复国运动所遭遇的种种艰辛和困难又切实加深了工党元老们的现实主义禀赋,并使其具备了一种刻苦务实、沉稳冷静以及善于灵活应变的行为品质。例如,现代犹太裔移民重建家园的历史实践就首先为以色列国家先驱们的务实品质提供了最刻骨铭心的锤炼。最早可上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成批犹太裔移民重新回到历史上的故乡以色列,而当他们面对满目疮痍、贫穷凋敝且生存环境恶劣的以色列时并没有灰心气馁,反而是以一种开拓者的精神坚持扎根故土辛劳开垦,无数先民们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甚至牺牲,在此基础上,一片片绿洲田园在以色列毫无生机的荒漠和沼泽中拔地而起,现代以色列国家建立的物质环境基础也随之雏形初现,包括工党元老在内的以色列国家先驱们不仅目睹了这一史诗般的开拓历程,他们中的许多人更亲身经历了其中过往,脚踏实地、务实实干的精神已经内化到他们的血液中去了。

再如,在早期世界锡安主义运动争取以色列自治时,为了获得以色列时任宗主国奥斯曼土耳其的公民资格并争取其信任,世界锡安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们曾集体主动降低姿态,抱着“奥斯曼化的理想”竞相迎合并追逐

<sup>①</sup> (以色列) 米迦勒·巴尔-祖海尔《现代以色列之父: 古里安传》,刘瑞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240页。



土耳其时尚,其中本-古里安本人就喜欢穿戴扁状的塔布什,并倾向于按照土耳其风俗修剪胡子。<sup>①</sup>类似的一系列爱好习惯甚至在他们被虚弱敏感的奥斯曼当局下令强制驱逐出境之后仍然保持了一段时间。本-古里安在后来的回忆中谈及有关问题时曾对此做出明确解释“我虽然不知道我的国家想要什么,但我非常清楚它究竟需要什么。”

## 2. 以色列决策层外交禀赋对美以特殊关系形成影响的分期实证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要判断以色列建国初期历任工党总理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特性及其对美以特殊关系发展的影响,实证的分期历史检验无疑是最好的观测方法。根据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具体变化,可将美以特殊关系彻底形成前的以色列外交划分为本-古里安、艾希科尔以及梅厄夫人三个时期。

以雷厉风行著称的本-古里安曾针对建国初期以色列地区战略与美国少有交集的特殊情况,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对美国的强硬立场,用以维护以色列根本性的国家安全利益。然而,一旦这一立场出现僵化并开始造成美以关系的实质性裂痕或者妨碍了以色列获得利益报偿之时,同样基于对以色列根本安全利益的慎重考虑,本-古里安政府会立刻松开以色列紧绷的外交神经,确保其与美国外交互动的灵活性。

具体实证的看,如前所述,在1956年前美以安全关系冷淡时期,为了尽可能地换取美国各种形式的安全保障并有效保留美以关系实现某种转型的潜在余地,本-古里安政府领导下的以色列完成了其对美国中东司令部计划从游离抵制到配合参与的行为转换。而自1957年开始,由中东地区权力格局剧变引起美以安全关系出现转机之时,嗅觉敏锐的本-古里安政府则进一步发挥了其现实主义的实用外交禀赋,合理且迅速地调整了以色列的地区外交策略。例如1957年秋,在大马士革出现完全倒向苏联的显著倾向后,察觉到威胁的本-古里安政府曾考虑过对叙利亚采取武力行动。然而,鉴于美国政府中东地区共同安全策略并未发生根本性调整且其已经给予了叙利亚当局某种程度威慑的现实,本-古里安政府最终放弃了诉诸武力的构想,进而保持了对此次叙利亚危机的自我克制,避免了阿以冲突的直接爆发,从而为美国的外交努力让出了较为充足的活动空间。作为回报,

<sup>①</sup> (以色列) 米迦勒·巴尔-祖海尔 《现代以色列之父: 古里安传》,第41页。

以色列获得了较此前少见地美国当局的明确安全许诺，1957 年底，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一封短笺中就少地向本 - 古里安强调了美国维护以色列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基本立场。<sup>①</sup>

再如 1958 年中旬，约旦爆发反侯赛因危机，在此次约旦亲美政权危机中，本 - 古里安政府顶住了苏联的巨大压力并成功地向美英等国持续开放领空，进而为后者对侯赛因政权的大规模空中支援提供了极大方便。以色列以这一实际行动博得了美国相当程度的好感。1958 年 7 月杜勒斯在会见以色列驻美大使时公开表达了美国对以色列开放领空行为的感激之情。同时，作为回报，以色列获得了美国 100 架无声机枪的军售。<sup>②</sup> 然而，在察觉到坚持地区共同安全战略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向以色列提供更进一步的安全保障后，为了在苏联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切实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务实的本 - 古里安政府又于 8 月初中止了以色列领空对美英的无偿开放。

艾希科尔任职以色列总理时，美以安全关系已经出现了根本转变，因而极尽可能地配合并维护美国的地区安全战略，夯实正在成型中的美以特殊关系——这一以色列安全的长远保障，自然成为艾希科尔政府务实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

具体来看，中东“六五战争”前艾希科尔对美国地区外交策略的积极配合和严格自我约束尤为令人印象深刻。1967 年 5 月纳赛尔下令埃及军队开进西奈半岛并摆出了咄咄逼人的姿态，中东地区紧张局势随之骤然升级。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中东地区战争引起的美苏间充满危险性的不必要冲突，饱受越战之困的美国开始频繁地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其中，美国助理国务卿卢修斯和尤金就接连代表美国当局向以色列驻美大使传达了希望以色列避免诉诸武力以及保持克制的强烈意愿。美国总统约翰逊更直接致函艾希科尔强调称“美国不会对未和美国协商的行动负责”<sup>③</sup>。鉴于美国的反战态度，艾希科尔在反复确认美国对以色列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后，以以色列国家的瞬时安全利益为代价，毅然做出了自我克制的决定。1967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以色列内阁会议中，艾希科尔力排众议，强调了以色列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必要性。

① Abraham Ben - Zvi ,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 Israel Alliance: The Jordanian Factor* , p. 29.

② Abraham Ben - Zvi ,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 Israel Alliance: The Jordanian Factor* , p. 41.

③ Lyndon B Johnson , *The Vantage Point: Perspectives of the Presidency 1963 - 1969* , Praeger , 1987 , p. 94.

颇具戏剧色彩的是,就在以色列做出克制决策的两天后,埃及当局又单方面宣布封锁蒂朗海峡,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随之急转直下,以色列国家安全遭到了切实的威胁,迅速采取必要的武力行动开始提上了艾希科尔政府的紧急议事日程。然而,在以色列将要做出紧急反应的当天,艾希科尔收到了美国要求以色列保持48小时克制且避免先开战端的紧急电报<sup>①</sup>,在充分确认了美国的坚决立场后,艾希科尔经过对美以安全关系重要性的再三考虑,决定继续保持相对温和的态度,尽最大可能以配合美国的地区安全策略。由此开始至当月27日,以色列接连收到了美国当局从多种渠道发出的要求其保持自制的信号,艾希科尔政府则务实的顺从美国意愿持续保持了克制。由于地区局势毫无缓和迹象且有进一步恶化的危险,5月27日晚,艾希科尔紧急召开内阁会议第一次明确地对以色列开战的可行性进行了高密度讨论,然而就在当晚,艾希科尔再次接到美国总统约翰逊的电报,电报称美国正在动用国际多边力量解除海峡封锁并警告以色列任何可能的单边行动都是不责任和危险的。<sup>②</sup>结果艾希科尔接受了电报的劝阻,冒着主战派的强烈责难和已经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风险,做出了延迟克制政策两个礼拜的最终决策。其间,艾希科尔再次强调以色列不能脱离美国自行其是,西奈战争的结局不能重演。<sup>③</sup>这样,直到同年6月初,在约翰逊政府的外交斡旋彻底陷入僵局之后,艾希科尔才在美国的默许下发起对埃及的武力进攻从而点燃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火。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战争爆发之后,艾希科尔政府依然反复强调称要通过一切可能的政治途径向超级大国(主要是美国)解释以色列迫不得已的最终立场,以求得其谅解和支持。在艾希科尔政府领导下,第三次中东战争惊人的以以色列的压倒性胜利告终,这一胜利在迫使中东地区力量均势开始显著倾向于美国的同时也奠定了以色列是美国地区霸权基石的现实,美国当局最终惊喜地发现以色列不仅乐于尊重和响应美国的外交安排,而且更能为美国带来切实积极的实际收益。由此,美国为以色列提供持久安全保障的信心得到了空前的增强,美以安全关系的特殊性也随之进一步得到了明确。

① Yaacov Bar-Siman-Tov, *Israel the Superpowers and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Praeger, 1987, p. 102.

② Abba Eban, *An Autobiography*, Random House, 1997, pp. 369-370.

③ Yaacov Bar-Siman-Tov, *Israel the Superpowers and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p. 120.

1969年，接替因病突然离世的艾希科尔——作为本-古里安重要追随者之一——工党元老梅厄夫人接任以色列总理。这一时期，美以特殊性的安全关系已经趋于成熟，以色列国家安全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有力支持。同时，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也由之前的公然争夺地区主导权逐渐调整为维持地区代理人均势。因此，基于对中东安全局势的清晰认识，强现实主义梅厄内阁再度将配合美国地区外交战略确认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而在此前提下，以色列利用美国对地区安全均势的迫切需要，从以色列国家利益出发，通过不断申明以色列对美国均势政策落实的成本支出，从而尽可能的换取美国足够的安全报偿作为梅厄夫人务实外交政策的重要补充。这一点又从一个崭新侧面展现了其内阁对外决策的现实性。例如，在1969年埃以危机期间，梅厄夫人同强压以色列的美国当局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讨价还价，并在美国将对以色列安全报偿的分量逐步提高到其满意的程度之后，方才响应美国方面的和平倡议解除了以色列对纳赛尔埃及的军事压力，进而推动中东地区局势实现了美国期望的稳定。然而梅厄夫人在美以关系互动过程中对于短期安全收益的讨价还价并不是没有限度的，避免实质性的损害美国地区安全政策进而保持美以特殊安全关系的足够弹性仍是梅厄时期以色列政府制定对美外交政策的基本底线，这一情况可以通过之后的美以关系互动加以检验。

20世纪70年代初，从越南战场顺利撤退的美国重新加强了对中东问题的关注。同时，中东局势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变动，秉持相对理性中立外交政策的萨达特开始执掌埃及政权，尼克松政府将之视为实现美国中东地区外交政策突破的难得机遇而加以特别重视。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以色列的外交态度出现了明显变化，1972年尼克松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美国过去的一系列政策让以色列产生了一种错觉，即无论以色列的行为多么不可理喻，美国都将给予其支持。如今（从中东地区全局利益出发）美国不能再继续纵容以色列的顽固态度了。<sup>①</sup>此后，在尼克松政府第二任期一开始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同苏联对埃、叙两国的积极援助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对以色列的军援保持了足够的低调<sup>②</sup>，其对以色列的援助力度被持续限制

<sup>①</sup> Elizabeth Stephens, *U. S. Policy Towards Israel: The Role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Defining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6, p. 142.

<sup>②</sup> Moshe Dayan, *Story of My Life*,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6, p. 518.

在保持埃以均势的程度上。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致萨达特的一封信中更明确表示,只要阿以达成停火协议美国就会立即终止对以色列的军援,并将致力于实现地区的持久和平。<sup>①</sup>此后,得到尼克松授权的基辛格越过同以色列协商的环节,直赴莫斯科同苏联展开停火谈判,并达成了要求阿以双方无条件遵守1967年11月通过的联合国第242号停火决议的最终协定。基辛格将这一协商结果通报以色列政府,并要求得到后者果断积极地响应。面对美国突然的越顶外交,梅厄夫人一开始怒不可遏,但经过再三冷静思考后,其内阁最后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果。因为梅厄夫人确信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保障是牢靠的,因为前者在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威胁的阴影下依然维持了对以色列的安全许诺。同时,务实的梅厄夫人也知道,在一段时期内,以色列的命运依附于美国,而后者往往有自己的利益考量。<sup>②</sup>

总而言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极度残酷的国际环境为以色列建国后持续执政的国家元勋工党元老们赋予了浓厚的现实主义务实禀赋。强现实主义者工党元老们在长期接力执政的具体过程中,自然且持续地奉行着务实灵活的外交方针,而类似的外交方针在为美以关系的深入良性互动留下潜在可能的同时又以其充足的弹性外交规避了美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失控风险。因此可以说,工党元老们持续担任以色列总理期间所秉持的现实主义实用外交作为一个重要辅助性因素,为美以安全关系的特殊化发展提供了切实强大的积极助力。

### 3. 美国决策层对以外交决策偏好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影响

作为美以双边关系的重要一边,美国外交决策者的思考方式及其决策行为对美以特殊关系的最终形成也无疑产生了深刻影响,虽然这种影响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大国战略上层主导的结果,但不同个性的美国决策领导人及其差异性的行为方式仍然给美以关系发展带来了一定变数。在美以关系由战略冷淡到逐渐特殊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以及约翰逊四位美国总统的决策判断影响较大。如果按照四位美国领导人对美以关系战略定位的基本态度来看,显然可以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归为一类,肯尼迪和约翰逊归为另一类。

<sup>①</sup>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Little Brown, 1982, pp. 522 - 523.

<sup>②</sup> Elizabeth Stephens, *U. S. Policy Towards Israel: The Role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Defining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p. 153.

具体来看，在杜鲁门尤其是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决策层接连拒绝在安全领域给予以色列当局必要的合作，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当局对以色列采取着一种战略疏离的消极态度，这一现象的持续存在固然扎根于战后初期美国的绝对安全理念及其既定的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政策，但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两位总统及其领导班子的决策思路也切实发挥了作用。

作为战后初期美国的首位总统，杜鲁门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极具两面性，一方面杜鲁门当局曾积极的大力支持以色列复国，而另一方面杜鲁门当局却对复国后的以色列保持着常态化的战略冷淡。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实际上也夹杂着杜鲁门个人独特的思维意识。众所周知，杜鲁门是一位虔诚甚至狂热的基督徒，一切与宗教相联系的事物都能引起他的极大热情。1946年，杜鲁门在一封致罗马教皇的信中公开阐释了其对宗教信仰的绝对忠诚，杜鲁门公开在信中宣称“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期望全世界的道德信仰力量能够联合起来，一同创造一个受上帝赐福的和平世界。”<sup>①</sup>在随后与罗马教廷的持续通信中杜鲁门接连强烈地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厌恶之情，他认为“所有珍视信仰上帝的人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共产主义无神论的邪恶教条”<sup>②</sup>，因为“国际共产主义否认上帝的存在，践踏和亵渎了神圣的信仰”。<sup>③</sup>这一系列表态直接反映出杜鲁门的两重基本个性，一重是对宗教信仰的极端忠诚，而另一重则是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极端厌恶。基于第一重个性，杜鲁门当局对犹太复国主义抱有极大的热忱，其视以色列复国为实现上帝诺言的正义之举，因而杜鲁门领导下的美国成为以色列建国的重要支柱。然而，建国后的以色列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表现出较为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集体社区性质的“基布兹”遍布全国，“基布兹”农庄更是占到了以色列农场比重的80%以上，执政的工党政府一开始与苏联也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外交关系。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厌恶，杜鲁门对“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以色列产生警觉并逐渐与其疏远，在1951年朝鲜战争

① William Inboden, *Rela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5 - 1960: The Soul of Contai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21.

② William Inboden, *Rela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5 - 1960: The Soul of Containment*, p. 112.

③ William Inboden, *Rela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5 - 1960: The Soul of Containment*, p. 112.

的问题中,美以两国甚至出现了公开的外交碰撞。此后,杜鲁门政府加强了以色列是美国中东集体安全战略不确定因素的消极印象,漫长的美以战略关系冷淡期也随之拉开了帷幕。

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是美国战后外交政策重要规划者之一,其外交政策刚猛、果断并且倾向于通过强力解决问题,这主要是建立在艾森豪威尔的二战英雄身份及其耿直军人性格的基础之上。英雄身份带来的威望足以抵消以犹太政治社团为代表的外来政治势力的巨大压力,而耿直军人的性格则为其外交政策的执行增加了足够定力。而就美以关系的发展来说,艾森豪威尔的两重身份则直接意味着美以两国外交关系回旋余地的大幅度减小。同时,对于经历过反法西斯战争联合作战风雨的战场老将艾森豪威尔来说,集体性的共同安全理念又是其难以割舍的情怀,这一情怀随着冷战对抗的不断升级而得以迅速加强。艾森豪威尔本人在任总统期间曾多次强调“只有集体安全才是自由世界的出路所在”<sup>①</sup>,“(美国)不应致力于实现美国单边治下的和平,相反,保证世界实现持久和平的最好途径是集体安全”<sup>②</sup>,并且“对侵略者的最大威胁即是爱好自由国家结成的坚固联盟”。<sup>③</sup>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集体安全理念逐渐占据了美国政府对外政策中的首要位置,以此为核心内容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名噪一时。然而,艾森豪威尔中东地区集体安全所强烈要求的阿以和解是以色列难以接受的,美国当局集体安全理念的进一步加强就意味着美以战略理念的渐行渐远。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大部分时期,美以关系陷入了漫长的停滞。然而,在这段时期内仍然存在着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最后一任国务卿赫脱对其既定政策的公然叛逆:不同于其前任杜勒斯国务卿的极端强硬,赫脱曾在多个场合对以色列释放了罕见的善意,他一度公开表态称“同情与理解以色列的安全诉求”<sup>④</sup>,并且多次呼吁美国当局重新考虑以色列的国防安全,向以色列出售武

① Brain R Duchin, *The “Agonizing Reappraisal”*, *Eisenhower, Dulles and the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6. No. 2, Spring 1992.

② Caroline Pruden, *Conditional Partner: Eisenhower, the UN and the Search for a Permanent Peace*, Iovisi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8.

③ Brain R Duchin, *The “Agonizing Reappraisal”*, *Eisenhower, Dulles and the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6. No. 2, Spring 1992.

④ Abraham Ben-zvi, *Decade of Transition: Eisenhower, Kenned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 Israel Allia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2.

器，虽然类似表态是在中东形势剧变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但这也直接表明，即使是对以色列最为冷淡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其内部也不都是铁板一块的。

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美国对以色列外交政策出现了重大转折，美以特殊关系的基本内涵得以初步奠定，虽然这一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东形势剧烈转向的结果，但肯尼迪及约翰逊两人对希伯来文化的崇拜及其浓厚的亲犹色彩仍然起到了不小作用。

肯尼迪是战后美国的第三任总统，肯尼迪及其副手约翰逊不仅是希伯来文化的痴迷者并且二者与犹太社团关系也颇为密切，同时，肯尼迪本人的当选也离不开犹太人坚定的支持，因此就感情方面来说，肯尼迪对待以色列的态度与其前任迥然不同，同情与理解一直是肯尼迪对以色列决策的基本态度。再者，受肯尼迪个人偏好的深刻影响，从其政府领导班子的基本构成来看，除以国务卿腊斯克为代表继承艾森豪威尔传统政策的保守派之外，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兰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派以及以总统特别助理梅尔为代表的亲犹派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明显有利于以色列的基本立场。比如实用主义派认为“重启对以色列军售并不会损害中东安全，因为这一措施可以有效阻止以色列的核武器计划”<sup>①</sup>。而亲犹派更奉行着“相互报偿的主动互惠”意识，强调美国“应以主动的合作姿态换取以色列的合作回报”<sup>②</sup>。这样，实用主义派以及亲犹派在对以决策问题上逐步达成了一致，进而呼应着肯尼迪总统的亲以色列情感。

1961年2月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埃及接受了苏联一批米格-19战斗机，以色列安全受到威胁”<sup>③</sup>为由，向肯尼迪政府提出了购买鹰式导弹的要求，虽然这一提议由于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而为立足未稳的肯尼迪政府否决，但肯尼迪本人的思想却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动摇：肯尼迪在随后与国防部现实主义派及其身边的亲犹派官员会商后，得出了一条明确的结论，即“以色列的安全确实处于劣势，对以色列出售鹰式导弹系统很有必要”<sup>④</sup>。这一结

①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 - 1968)*, Arab - Israeli Dispute, 1964 - 1967, Volume XVIII,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 150.

② Abraham Ben - Zvi, *Lyndon B Johnson and the Politics of Arms Sales to Israel*, Chase House, p. 10.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 - 1963)*, Near East, 1961 - 1962, Volume XVIII,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 2.

④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 - 1963)*, Near East, 1961 - 1962, Volume XVIII,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 43.



论表明肯尼迪政府对以色列的基本政策是具有回旋余地的。看到希望的以色列当局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不断加强对肯尼迪政府的说服工作,肯尼迪政府的立场则也随之出现了进一步的松动。

到了1962年8月,随着中东形势的进一步转变以及在任政府执政根基的初步巩固,肯尼迪与国防部和总统顾问团的亲以力量逐步达成联合,在排除了以腊斯克为首国务院保守派的重重干扰之后,美国当局终于做出了向以色列出售鹰式导弹系统的重大决定,至此美以关系的基本面貌焕然一新,特殊性的概念也随之崭露头角。1964年,约翰逊接替遇刺的肯尼迪出任美国总统。作为肯尼迪政策的忠诚追随者,约翰逊不仅完整地继承了前政府的亲以立场,而且更从美国的国家战略出发,将美国对以色列关系又提升了一个档次。然而与肯尼迪不同的是,作为一位典型的实用主义者,约翰逊在推行对以色列照顾政策的同时,仍然没有忘记对这个新晋中东盟友的战略约束,1967年中东“六五战争”中美以关系的互动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总而言之,虽然美国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制定主要取决并服务于美国的地区乃至全球战略利益,但不同美国领导人差异性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也确实对美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切实的影响。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偏执和强硬的决策行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明显遏制了美以关系良性进展的可能;与之相反,肯尼迪和约翰逊务实灵活以及倾向性的决策行为方式则有力地推动和辅助了美以关系的顺利转型,两国关系的特殊性意义则在这种转型中得到了初步体现。

#### 四 部分结论的再检验

史学研究领域中,有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同自然科学相似,历史学是一门具有逻辑理性的社会科学,其总是受到自然法则的规律性支配。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相较于强调客观性的自然科学而言,历史学又是一门强调主观性的意识学科<sup>①</sup>,其客观性由于经常受主观因素的干扰而遭到人们的不断质疑,甚至有激进者认为历史学只不过是任人打扮的小

<sup>①</sup> 部分历史学家认为由于历史学的相关史料是由人撰写的,人们筛选史料的过程伴有明显的选择性且研究历史人员的价值观也不尽相同,因此历史学并不具备科学性而只是一门艺术。

姑娘，根本不存在什么科学理性。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与自然科学相比，无论历史学本身的主观色彩有多么强烈，客观科学性依然始终是其本质所在。如果强行否认这一点，我们就有可能陷入不可知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 1. 变量控制

既然历史学具备显然的科学性，那么我们就应该可以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上文中经过层次分析和史料初步实证的具体结论做出进一步明确的科学检验。变量控制是自然科学领域内一种最基本和最常见的研究手段，研究人员常用控制、稳定和排除干扰变量的方法来观察其研究对象的某种确定性状。然而，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无法人为地控制和改造干扰变量，比如史学家就不能用排除和控制历史史实的方法推导历史结论。但不进行变量控制，就无法进行令人信服的科学分析，进而辨清历史现象复杂成因的具体权重，因此需要建立起一个适合历史科学的变量检验方法。这里，笔者认为国际政治领域的案例选择法值得借鉴，即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案例选择，在历史背景相同或其他历史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检验少数具有差异性的历史条件对研究对象产生的具体影响是否与史料论证的结果一致。其方法步骤可表示如下：

明确待检验结论→明确可控制变量（即稳定的历史条件）→选择自变量取值不同（即差异的历史条件）且相关变量可控的案例→观察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具体关联→验证待检验结论。

具体就本文所论问题而言，影响美以特殊关系形成的原因纷繁复杂，要科学准确的衡量这些成因的切实影响和具体权重，就需要引用变量控制中的求异比较法对其加以检验。而软硬体系层面上的关键因素“战略利益”和“文化认同”则是两个互相干扰且最具影响力和比较价值的活跃要素。下面，笔者就对这两种要素逐一展开检验。

待检验研究结论 1：在战略利益稳定的前提下，文化和制度认同是影响不同种类双边关系形态的关键因素，即与美阿关系相比，相通的文化价值理念是美以特殊关系得以形成的柔性基础（见表 1）。

求异比较：

表 1

案例	自变量取值	控制变量	因变量取值
冷战时期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 (案例一)	不存在文化制度认同	NSC47/2 文件要求美国支援和拉拢阿拉伯国家	冷战时期,在安全领域美阿之间没有形成特殊关系
冷战时期美国与以色列关系 (案例二)	存在文化制度认同	NSC47/2 文件要求美国支援和拉拢以色列	冷战时期,在安全领域美以之间最终形成了特殊关系。

注:表 1 中。自变量取值为 X, 案例一自变量取值为  $x_1$ , 案例二自变量取值为  $x_2$ ; 控制变量为常数 a, 因变量为 Y, 案例一因变量取值为  $y_1$ , 案例二因变量取值为  $y_2$ 。

解释: 本次检验按照求异比较最为常见的案例选择规则, 选择了美以两国为核心包括冷战时期美阿、美以外交关系在内的一对横向案例进行比较。在这对案例中,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在战后美国中东地区外交估算中同等重要的战略价值是一个稳定的可控制变量即常数 a ( $a > 0$ )<sup>①</sup>, 出现性质变化的自变量 X 则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差异性的文化价值理念, 在这种差异性的文化价值理念中, 以色列与美国共享着相通的文化制度话语 (即  $x_2 > 0$ ), 而阿拉伯国家和美国之间则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制度分歧 (即  $x_1 < 0$ ); 此即如前文所证, 以色列与美国外交关系虽然经历过波折, 但两国间的联系却从未出现过实质性中断, 与之相反, 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却由于文化认同层面的脆弱性而经常出现令人错愕的剧烈变化。因而相较于冷战时期美阿关系持续性的动荡波折 (即  $y_1 < 0$ ), 美以关系在遭遇短暂的挫折之后, 逐步走上了平稳且特殊化的长期发展道路 (即  $y_2 > 0$ )。因此, 本次检验中在关键干扰因素“战略价值”稳定的情况下, 对横向空间层面上的两种不同外交关系而言, 文化认同 X 与外交结果 Y 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这种关系符合预期, 故待检验结论通过检验。

求异检验的简约公式表达:

在本次检验案例一中, 美阿外交关系的公式可表示为  $x_1 + a = y_1$ , 常数 a 取值固定且为正值, 由于  $x_1 < 0$ , 所以  $y_1 < 0$ 。

在本次检验案例二中, 美以外交关系的公式可表示为  $x_2 + a = y_2$ , 常数

① 战后美国中东地区的基本外交政策是集体性的共同安全政策, 在这一政策驱动下,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 1949 年出台了 NSC47/2 号文件, 该决策文件强调美国要不偏不倚的同时支援和拉拢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

$a$  取值固定且为正值, 由于  $x_2 > 0$ , 所以  $y_2 > 0$ 。

因此, 本次检验中, 在常数  $a$  为正值且固定的情况下, 自变量  $X$  与因变量  $Y$  呈正相关关系, 故预设结论通过检验。

待检验研究结论 2: 在文化制度理念相通的情况下, 战略利益是影响同一双边关系在不同时期具体形态的关键因素, 即战略利益契合度是美以两国特殊关系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见表 2)。

求异比较:

表 2

案例	自变量取值	控制变量	因变量取值
1957 年前美国与以色列关系 (案例一)	美以战略契合度较低	美以两国间存在文化制度认同	在安全领域没有形成特殊关系。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美国与以色列关系 (案例二)	美以战略契合度较高	美以两国间存在文化制度认同	在安全领域形成稳固的特殊关系

注: 表 2 中。自变量取值为  $X$ , 案例一自变量取值为  $x_1$ , 案例二自变量取值为  $x_2$ ; 控制变量为常数  $a$ , 因变量为  $Y$ , 案例一因变量取值为  $y_1$ , 案例二因变量取值为  $y_2$ 。

解释: 本次求异检验选择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以及 1957 年之前两个时间段的美以外交关系作为一对纵向案例进行比较。在这对案例中, 美以两国间相通的文化制度特性是一个稳定的可控制变量也即常数  $a$  ( $a > 0$ )。而发生变化的自变量  $X$  则是美国与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契合度。如本文前证, 在 1957 年前, 美以两国在地区战略安全观上存在显著差异, 两国之间的战略契合程度较低且关系相对冷淡 (即  $x_1 < 0$ ), 无论是美国争取以色列合作的努力还是以色列多次向美国寻求安全保障的努力都常以失败告终, 因而这一时期的美以关系并不具备特殊性 (即  $y_1 < 0$ )。1956 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 随着中东地区形势自 1957 年开始的剧变以及美以安全观的双向调整, 两国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显著转机。自 20 世纪 60 年代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开始, 美以两国间的战略安全观逐渐相向而行, 其战略契合度也随之最终保持在了较高的水准上 (即  $x_2 > 0$ ), 在此条件下, 美以关系逐步显现出了一种特殊性 (即  $y_2 > 0$ )。综上所述, 本次检验中, 在主要干扰因素“文化认同”被控制的前提下, 对纵向时间层面上的同一种外交关系而言, 战略契合度  $X$  与外交结果  $Y$  之间呈

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符合预期,故待检验结论通过检验。

求异检验的简约公式表达:

在本次检验案例一中,1957年前美以关系的公式可表示为  $x_1 + a = y_1$ ,其中,常数  $a$  取值固定且为正值,由于  $x_1 < 0$ ,所以  $y_1 < 0$ 。

在本次检验案例二中,20世纪60年代后美以关系的公式可表示为  $x_2 + a = y_2$ ,其中,常数  $a$  取值固定且为正值,由于  $x_2 > 0$ ,所以  $y_2 > 0$ 。

因此,本次检验中,在常数  $a$  为正值且固定的情况下,自变量  $X$  与因变量  $Y$  呈正相关关系,故预设结论通过检验。

最终检验结论:硬权力层面的战略利益要素以及软权力层面的文化认同要素对于国家间外交关系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战略利益相和但缺乏文化认同的国家之间很难形成持久稳定的外交关系;文化相互认同但战略观念冲突的国家之间不能开展灵活有效的合作。只有文化相互认同、战略理念高度契合的国家之间才有可能建立起牢固的互信。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则显然是战略利益和文化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单就美以关系的实证和检验而言,现实主义的利益决定论以及建构主义的认同至上论都存在明显的偏颇,因为从哲学层面讲,物质决定意识,但意识对物质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人类社会是物质与意识长期互动的结果,抛开物质讲意识,抛开意识讲物质都不是科学严谨的态度。

## 2. 反事实推理

历史纯正主义者强调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不能进行假设,对史实进行假定的反事实推理毫无意义。然而,他们却忽视了一点,即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不仅要努力了解已经发生的事实,而且还要努力了解这些事实发生的原因和性质。因为单一的事实本身并不能向人们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反事实推理作为一种思维实验其目的并不在于通过臆断建立或者否定一种实证的历史结论,而是在于加深对某一现实历史事件的具体理解,推理的结果并不妨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她只是在提醒人们要对既定历史事件进行反思并总结其经验教训。因此,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就是把已经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但也有很多历史学家主张,恰当的反事实推理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sup>①</sup>

<sup>①</sup> (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七版),张晓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70页。

如本文前证,影响美以特殊关系形成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并且每种原因本身又是相对充分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美国与以色列形成特殊关系这一历史事件是“过于确定”的。既然这一历史事件“过于确定”,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它的发生是必然的呢?答案是趋于否定的,因为“过于确定”并不等于必然发生,可能与现实之间还需要一个转化过程。实际上在美以关系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偶然因素(或者说直接诱因)所起到的转化作用不容低估。我们知道,某个确定事件发生的原因大体分布在三个层次上,即表层的直接原因、中层的中间原因以及底层的根本原因。其具体效用可以用手榴弹爆炸的例子进行类比:在这一事件中,引起手榴弹爆炸的直接原因是有人拉了保险,中间原因是手榴弹被制造了出来,根本原因是火药的易爆特性。其中,根本与中间层次的原因意味着手榴弹爆炸的可能性很大,但可能性大并不意味着手榴弹爆炸的事件一定会发生,因为直接原因的导火索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如果没有人向手榴弹施加拉动保险的动作,那么一个质量合格的手榴弹是绝对不会自行爆炸的。也许会有人这样认为,在根本原因确定的情况下,触发某一事件的直接原因早晚都会出现,也就是说易爆的火药在被制成手榴弹这一武器后,早晚会有人将它投入使用。然而,这一判断所遵循的逻辑却明显是虚假的,因为火药易爆以及手榴弹被制造与有人拉保险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在没有战争威胁或军队无相关训练需求的情况下,成品手榴弹可能会被长期封存在军火仓库中直到其过期报废。

既然偶然性的直接原因对某一确定事件的发生具有切实甚至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对偶然性直接因素在美以特殊关系形成这一历史事件中所起作用的探讨也就不能回避了。下面笔者就用反事实推理的方法检验和确认偶然直接因素对美以关系特殊化发展进程的具体影响,也即检验和确认美以特殊关系形成这一历史事件是不是一定具有必然性。笔者认为,在影响美以特殊关系形成的多种突发因素中,1956年由英法两国挑起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尤为重要。在这场战争中,以强硬立场著称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因“抵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灵魂人物,其在战后获得了阿拉伯民族英雄的美誉,享有如先知一般崇高的声望。借此机遇,纳赛尔狂热且持续不断地向阿拉伯各国输出其激进的民族思想,这种思想大幅激化了中东地区阿拉伯各国被英法侵略行为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而快速瓦

解了阿拉伯国家与西方世界脆弱的互信基础。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随着激进纳赛尔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崛起，主要阿拉伯国家迅速且普遍的僵化了同西方世界领军力量美国的外交关系，并置后者共同安全构想于濒临破产的地步，这一情况出现严重限制了美国中东地区外交政策的选择余地，致使其将中东地区外交战略由共同安全逐步调整为地区均势，在此基础上，美国与以色列最终确立了特殊化的双边关系。对此，英国学者罗格兄弟在其著作《苏伊士 1956：危机与后果》中曾准确地评价道：“（苏伊士运河战争）是现代阿以冲突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中东政策转型的重要里程碑。”<sup>①</sup>

但如果假定 1956 年英法不误判形势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或者其战争计划为美国获取而遭其阻止的话，那么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一种最具可能的情况是，美国与主要阿拉伯国家之间会因现实利益的联系而持续维持着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虽然这种合作关系的认同基础是脆弱的，但它并未被打破。试想如果没有 1956 年的那场战争，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可能不会被点燃，纳赛尔也就不会获得传播其激进主张的足够号召力，中东地区的极端势力也就不会出现最终合流而给予西方国家公信力以致命打击，并且从 1957 年前美国中东地区外交政策来看，其对阿拉伯国家的态度是温和且富有建设性的，双方的外交互动并不存在明显的冲突热点，因此，中东地区可能会形成一种较西欧松散的联合对苏关系<sup>②</sup>，而这种关系的形成就直接意味着美国与以色列在安全领域建立特殊关系的可能性的大幅降低。因为在 1957 年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及其国务卿杜勒斯已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构建美以双边性安全合作机制的冷淡态度，而从这一时期美国多个中东问题的政策声明来看，在共同安全的构想中阿拉伯国家显然拥有比以色列更为优先的战略地位。也就是说，只要美阿之间的合作关系能够继续维持，哪怕只是低限度维持，美以特殊关系（尤其是特殊性安保关系）的出现就会困难重重（见图 1）。

综上所述，1956 年突发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作为一个偶然因素实际上大幅扭转了中东地区的整体形势，以手榴弹保险拉动者的直接效用触发了美

<sup>①</sup> Louis Roger & Owen Roger, *Suez 1956: The Crisis and Its Consequence*, Clarendon, 1989, p. 86.

<sup>②</sup> 苏联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与阿拉伯原教旨主义存在冲突，中东民族主义强人卡扎菲就既反美又反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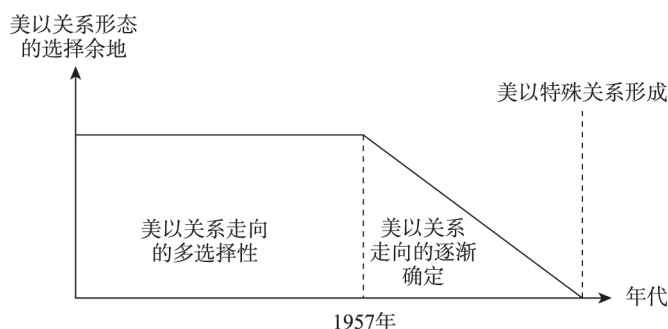


图1 突然变窄的美以关系形态选择区间

以特殊关系由可能到现实的最终转化。由此，可以做出一种结论性判断，即一国在推行其外交战略时必须重视对偶然性直接因素的控制和利用，只有合理地发现和利用偶然因素的转化器作用，一国才有可能实现外交利益的最大化，反之亦然。

## 余 论

综上所述，在国际体系层面的软硬结构中存在着战略利益渐进叠合、宗教和制度认同（文化身份认同）、以色列特殊的行为体特性以及中东地区深度破碎的地缘环境是四个促成美以特殊关系形成的主要因素。其中，战后初期美以国家行为体在中东地区体系结构互动过程中具体战略利益的逐渐叠合，不仅大幅削弱了美以两国间原本严重的现实分歧，而且更使两国走上了共享地区战略目标的密切合作道路，这种由战略利益高度契合带来的密切合作则为两国特殊关系的最终形成奠定了牢固的现实基础。而高度共鸣的宗教和制度认同又为美以两国的外交关系赋予了分而不裂、和而至密的紧密特性，这种由文化身份认同带来的美以外交联系的紧密性则又为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柔性基础并为其赋予了文明同化的深远战略意义。另外，在战后中东地区不同权力外交博弈的全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规律性现象，即战略利益一度相和但缺乏文化认同的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很难形成持久稳定的外交关系；而文化高度认同但战略观念一度冲突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不能开展灵活有效的合作，只有在文化高度认同且战略利益逐渐叠合的情况下，美国与以色列之间方才形成稳定亲



密的特殊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战略利益的高度契合与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缺一不可的相互建构作用才是美以特殊关系得以形成的根源所在。而以色列特殊的行为体特性以及中东地区破碎化的地缘特征作为辅助性的外部条件,在美以特殊关系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切实的外部催化和刺激作用。

在国内层面的分析中,存在着美国犹太社团对美以关系特殊化发展的积极推动以及以色列内政对美国外援的严重依赖两个促成美以特殊关系形成的重要因素。外交是一国内政的重要延伸,两个侧面的国内政治要素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着美以两国外交关系的基本走向,并为美以两国的外交联系赋予了极大的黏性,而这种黏性不仅有力推动了美以特殊关系的最终形成,并且其本身也构成了美以特殊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犹太社团对美以特殊关系形成的影响往往被高估,而实际上犹太社团的一些系列活动并未与美以特殊关系形成发展的历史曲线呈完全的正相关,美国犹太人政治力量并非美以特殊关系形成的根源,其对这一特殊关系形成的影响也并不是决定性的。

在个人层次的分析中,秉承现实主义工具理性的工党派系总理从本-古里安、夏洛特、艾希科尔到梅厄夫人不间断的接力执政使以色列决策层的外交决策具有务实灵活的特点,而这种务实灵活则有效规避了美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并且维持着美以关系实现某种特殊化转型的潜在可能。而以肯尼迪为代表的亲以领导人的决策偏好也对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起到了不容否定的切实作用。

就层次分析法分析的结果而言,层次分析法分析某一事物的出现和发展时,存在三种可能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三个层次的分析结果完全一致且为正值,这意味着待分析对象的出现和发展是充分和深刻的,因为三个层次的变量(自变量)对待分析对象(因变量)的作用力方向一致且合力最大;第二种情况是,三个层次的分析中,有一个层次的分析结果与另外两个层次的分析结果不一致,这就需要观察三个层次作用力产生的合力的作用方向,合力为正值,待分析对象的出现和发展就具有充分性,反之相反;第三种情况是,三个层次的分析结果都不一致,这时,分析对象的出现和发展由作用力最大的层次变量决定,但如果三个层次的作用力都是近似的,那么这意味着层次分析法不适用于分析对象的分析。具体就本文

实证分析而言，三个层次上不同性质、作用的成因变量对美以特殊关系形成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均为正值且方向一致，其作用力的合力最大，因此可以认为美以特殊关系是两国外交决策战略性选择而非暂时性和战术性选择的结果，其最终形成是充分且深刻的。

[责任编辑: 李 玮]

**Keywords:** Turkey , AKP , Turkish Policy in the South Caucasus , Constraint

## Research on Causes for American-Israel Special Relationship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Hierarchical Analysis

*Li Yunpeng*

**Abstract:** The causes for the American-Israel special relationship can be interpreted through a three-leveled categorization: International system structure , domestic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ers. A series of effects at three levels have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Israel special relationship having the same orientation. Therefore , it can be suggested that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is a strategic choice. Finally , through ‘variable control’ and ‘counter factual reasoning’ , it can be suggested that joint ac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es to cultural identity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is the mixed promoting factor that establishes some aspects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Nevertheless , direct influence from other kinds of accidental factors can't be ignored.

**Keywords:** American-Israel , Special Relationship , Historical Causes , Hierarchical Analysis

##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espotism of Egypt in the Old Kingdom

*Guo Zilin*

**Abstract:** The despotism of Egypt has its historical roots in the Old Kingdom. It was comprised of three important factors. The kings were endowed with a kind of sacred nature , and , thereby , held some supreme powers such as legislation , judicial , military , economic and religious management , carrying out their rul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officials. This system was the result of